

托洛次基自傳

LEON TROTSKY MY LIFE



譯著 勝利

托洛次基自傳

LEON TROTSKY MY LIFE



譯著 勝利

※托洛次基自傳※

原 著：LEON TROTSKY

譯 著：勝 利

發行人：溫 剛

出版者：問學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25號9F

新聞局登記登字版台業字第1676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77年8月8日

總 經 銷：勝利書攤

攤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100號前

郵撥帳號：1170349-3

帳 戶：楚 有 勝

連絡電話：341-9416

LEON TROTSKY MY LIFE



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



序	二
雅諾甫卡	五
學校	八
鄉村和城市	一三
我的第一段革命生涯	一九
流放和脫逃	二五
第一次亡命國外	三一
黨大會與分裂	三七
歸國	四三
一九〇五年	四七
審判，流放，脫逃	五五
第二次亡命國外 德國社會主義	六三
準備新革命	七〇
大戰開始	七五
巴黎與青梅瓦爾	七九
被法國驅逐至西班牙	八四
從紐約到一個集中營	八八
在彼得格拉	九四

從七月到十月	一〇二
決定大事之夜	一〇八
當權	一一四
在莫斯科	一二三
布勒斯特談判	一三一
和約	一三五
在斯維亞志斯克過的一個月	一四一
火車	一五三
保衛彼得格拉	一六四
採行新經濟政策及我與列寧的關係	一七五
列寧之病	一八一
不肖門徒輩底陰謀	一九六
列寧之死和政權移轉	二〇六
黨內鬥爭底最後階段	二一七
流放	二三一
驅逐出國	二四〇
跋	二五二

此書是在放逐中於君士但丁堡近旁的普林基博島 (Ile de Prinkipo) 上寫的，至今已有四年了。現在加以多量的刪節，印行一個新版，獻給讀者。著者希望此書不因這次刪節而大受傷損，而且能因此去接近廣大的讀衆——此書當初本是爲廣大的讀衆而寫的。

里昂·托洛次基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

序

我不能否認，我的一生並非屬於最平凡的。但這不平凡底原因，與其求之於我自己，寧可求之於時代環境。當然，也必須有若干個人特性存在，來履行我所履行的任務，不論這些任務是好的或是壞的。但是若在其他人的歷史環境底下，則那些個人特性也許平平和平和地隱沒不彰了，正如無量數不合社會生活要求的人類嗜好和熱情隱沒不彰了一般。反之，現在被踐踏或被壓抑的其他一些性格，也許可以發揮出來的。客觀的超出於主觀的之上，歸根結蒂還是客觀的決定一切。

我的自覺的和積極的活動——約開始於十七歲或十八歲時候——是在爲了某些確定的觀念而不斷地鬭爭。我的私人生活裏面，沒有一件事情本身值得公衆注意的。我的過去生活，所有的事實，無論如何不值得注意的，卻都有關於革命鬭爭，而由此鬭爭獲得意義。惟有這一點纔能够辯解我出版這本自傳。

這書出版時候，我有五十歲。我的生日恰好是十月革命底生日。那些神祕家和畢達哥拉斯

●譯者按：畢達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紀時人，或云某神祕宗教派爲託的祖師，實無其人。據說算學上和天文學上一些重要定理是他發明的。畢達哥拉斯學派以「數」爲神祕，凡事都可以拿「數」來解釋。

(Pythagore) 底信徒可以由此推演出他們所要的結論。我自己則是十月革命三年之後纔發覺這個奇異的巧合的。直至九歲以前，我生活在一個閉塞的鄉村，未曾走出一步。以後八年之間我修畢了中等學業。我第一次被捕下獄，在出校之後一年。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般，我也是拿監禁，流放和亡命當作大學的。我在帝制時代坐了二次牢，共關過四年長久。我第一次流放約有二年，第二次流放幾個星期。我從西伯利亞逃脫兩次。我亡命國外兩次，在歐美各國共過了十二年生活。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亡命二年，革命失敗之後差不多亡命十年。大戰時（一九一五年）我被德國霍亨索倫皇朝缺席判決徒刑；第二年，我被法國驅逐到西班牙去，在馬德里監獄中關了一個短時候，又被警察監視在加狄克士（Cadix）住了一個月，然後被驅逐到美洲去。二月革命到來時，我在美國。一九一七年三月間，我從紐約回國途中被英國人捉去在加拿大一個集中營內關了一個月。我參加過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我當過一九〇五年彼得堡蘇維埃主席，以後一九一七年我又當過這個職務。我積極參加十月革命，以後為蘇維埃政府之一員。我以人民外交委員資格，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同德、奧、匈、土，保諸國代表進行和議；以後又以人民海陸軍委員資格用五年光陰組織紅軍並重建艦隊。一九二〇年中，除此工作以外，我又擔負那主持當時陷於混亂狀態的鐵路網工作。

除開那幾年國內戰爭不說，我的生活主要地是做黨底活動和著作。「國家出版局」於一九

二三年進行出版我的全集，業已出版十三卷了，以前出版的五卷軍事著作尚未計算在內。一九二七年，對於「托洛次基主義」的壓迫變成特別狂烈了時候，我的全集遂停止出版。

一九二八年一月，我被現時蘇維埃政府流放於中國邊界上，在那裏過了一年；一九二九年二月，我被驅逐到土耳其；我今是在君士但丁堡寫這幾行字的。

我不得不在亡命之中寫這幾行字，——這是我的一生第三次亡命了，此時我的最親近的朋友充塞了蘇維埃共和國底流放地和監禁所，這個共和國本是他們以決定的方式幫助建立的。我本習慣於拿另一個觀點，不同於我個人命運底觀點，去看歷史底前途。認識那已成事實底規律性，而在此規律性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本是革命家底第一個責任。這也是凡不將自己的任務混同於目前利益的人，所能企求的最高的個人滿足。

里昂·托洛次基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於普林基博

雅諾甫卡

我的童年時代，沒有啼饑，沒有號寒。當我生時，我的雙親底家庭已經有相當的資產。但那是那一類人底嚴肅的生活，他們從貧苦出身，向上爬，不肯中道而廢。所有的筋肉都是緊張的，所有的思想，都是集中於工作和積蓄。在這種生活裏面，留給小孩子的位置是很微薄的。我們沒有吃苦，但也未曾享受生活底豪華和溫柔。我的童年時代，對於我既非如極少數人底日暖春和，亦不同於大多數人底忍饑挨打受辱。這是一個完全淡灰色的童年時代，在偏僻區域，鄉村裏，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當中，那個地方，自然界是寬闊的，但習俗，意見，利益等則是褊狹的，小家氣的。

我出世那一年，是俄國帝制第一次受炸藥打擊之年。不久之前成立了恐怖主義的「民意黨」(Narodnaya Volia)，這黨於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我出世之前二個月，判決亞歷山大第二死刑。發生了一個可怕的鬭爭，結果亞歷山大第二於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被刺殺，但「民意黨」也因之斷送了。

俄土戰爭結束於一年以前。一八七九年八月，俾斯麥立下了奧德同盟底基礎。維克多·雨果和路易·白朗，於一八七九年，要求法國衆議院赦免公社派罪名……但無論議會辯論，或樽俎折

衝或甚至炸藥爆裂，都未曾在雅諾甫卡鄉村得到回聲，——我便是在這個鄉村出生的，且在其中渡過我的一生底最初十個年頭。在赫森省（Kherson）無邊無際草原裏面，那個小麥和綿羊國土依據牠的特殊律法過生活。空間寬闊和道路缺少，很妥實地防護着牠，抵制政治底侵入。那裏，還留下無數的草原「丘陵」作為民族大遷徙時里程碑用的。

我的父親是個以農耕為業的人，起初家業很少，以後富足起來。他做小孩子時，就隨着他的家人離開波爾塔瓦省（Poltava）一個猶太小居留地，到南方的自由草原來，建立他的家業。

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過着勞動的生活；他們二人之間並非沒有衝突的，但一般說來仍是很友愛，雖然二人性格很不相同。我的母親是城裏小市民家庭出身，看不起胼手胝足的種田人。但我的父親年輕時是個美男子，漂亮的身裁，剛強而有毅力的容貌。他積蓄了一點錢，幾年之後居然買得了雅諾甫卡村（Yanovka）。年輕的女人從省城到一個草原村子來，起初是不習慣於農業勞動底艱苦生活的，但終究完全同化於這個生活，從此以後就沒有離開這個生活，差不多四十五年長久。這個婚姻產生了八個小孩子，惟有四個養大起來。照出生次序，我排行第五。四個孩子很小就死去了，害白喉，害猩紅熱，死去的，他們差不多是沒有受人關心而死去的，正如別的孩子沒有受人關心而活下來的一般。土地，牲畜，家禽，磨坊，佔據了一切時間，不容許人家照顧其他甚麼事情。時序輪替着，不間斷的田地勞動壓抑了家庭親愛。家庭之中沒有溫柔，尤其在最初幾年。但有着一種深

刻的聯繫勞動聯繫在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中間

我的母親死於一九一〇年，但我的父親直活到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後。國內戰爭在南方延續得特別長久，政權時刻變換；當戰爭最烈時候，這個七十五歲老頭子不得不步行幾百公里道路，去敖得薩（Odessa）找一個臨時棲身之所。紅黨是危險的，對於他，這個大地主。白黨又迫害他，因為他是我的父親。當蘇維埃軍隊肅清了南方時候，他得有機會到莫斯科來。十月革命當然剝奪去了他一生所積賺的一切。他在莫斯科近郊管理一個國有的小磨坊，管了一年多。當時的人民糧食委員邱盧巴（Tsurupa）愛同他談論農業問題。我的父親害傷寒病死於一九二二年春天；死的時候，我正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做報告。

學校

一八八八年，我的生活中開始了大事變。人家送我到敖得薩讀書去。我的母親底姪兒史本哲爾（Эбенер）底家教，與其說是嚴厲的，寧可說是有規則的：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初時纔認為是嚴厲的。人家限定我於九點鐘上床。我漸漸昇級，人家纔漸漸允許我遲睡一點。人家一點一點教訓我：早晨應當問安，手和指甲應當洗乾淨，不要拿刀子送食物進嘴裏去，不要遲到，女僕服侍你時應當向她道謝，不要在人背後說人壞話。我懂得了，那幾十個字，我在鄉村以為最正確的，其實不是俄國字，而是四不像的烏克蘭字。每天，我都發現了一角世界，比我一生最初九年渡過的，更優雅些。雅諾甫卡作場，我童年時代過了幾次如此美好的生活，此時關於牠的回憶也開始黯淡了，也開始失去其魔力在古典文學底誘惑和戲劇底迷醉前面了。我成了一個小市民。但有時，鄉村忽然在我的意識內閃光，令我記起牠猶如記起失去的樂園。於是我害起思鄉病來了，我坐立不安，我拿指頭在窗子玻璃上給我母親寫信，我又在枕頭上流眼淚。

聖保羅實科學校是德國人開辦的，附屬於路得教會，爲了滿足那些居住敖得薩和南俄的多數德國人底需要。這個學校國家准許立案，但因祇許開辦六級，若是要進高等學校的話，就非到另

一個實科學校去讀「第七級」不可。政府多半是希望以此手段剷除過多的德國精神的。其實，在聖保羅學校裏，而德國精神本是一年減少一年了。德國學生不滿全校人數之半，德國先生也是被當局逐漸淘汰了的。

我就這樣做了學生了。我很早起床，匆匆喝了茶，把早點心用紙包着塞在大衣口袋裏，一口氣奔到學校去，爲的趕上早晨祈禱。我從不遲到。我靜靜坐在凳子上。我注意聽講，用心抄下黑板上寫的東西。我回家來很用功做功課。我在規定的鐘點上床睡覺，爲的第二天能够早起喝茶，又奔到學校去，害怕趕不上早晨祈禱。我按照規則由這一級昇到那一級。我在街上遇着先生時，便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

我住在城市，差不多沒有和城市接觸。城市的生活差不多完全與我不相關地過着。不僅與我不相關而已。居民之中，那些成年人也是竭力避免探頭窗外的。實在說，敖得薩乃是警察節制的全俄國中最受警察節制的城市。

那裏的主要人物乃是前海軍少將現任警察局長計僚諾衣（Zelenoi）。他的無限制權力配上了一個肆無忌憚的脾氣。敖得薩人互相低聲傳說他的無量數的軼事。在外國，一個自由的出版局，那時印行了一個集子，完全關於海軍少將計僚諾衣底豐功偉烈的。我祇看見他一次，而且祇看見他的背脊。這就夠了。這位局長全身站立在他的馬車上，沿街揮着拳頭，用嘶啞的聲音咒罵着。他

的前面一排排警察向他舉手行禮，一個個門丁脫帽鞠躬。街旁人家窗簾背後半露着吃驚的面孔。我抓緊了書包底皮帶，急忙回家去。

每逢我要在記憶裏復現少時所見官式的俄羅斯影像時，我就見着了這位局長的背脊和他的揮舞着的拳頭，我又聽着了他的嘶啞的謾罵聲，那些謾罵的話，在字典上都找不着的。

我從童年起就時常同人家衝突；拿法律家底話來說，這些衝突是爲了替那被踐踏的權利奮鬥而引起的。這個動機往往決定了我與同伴之間的結交和絕交。這類事情一件一件說起來是太長了。但我在學校裏還有更重大的故事哩。

最大一件事就是我在二年級時候同布爾蘭（Burnand）的交涉，——大家都叫布爾蘭做「法國人」，其實他是瑞士人。布爾蘭進行一個殘酷的戰爭反對德國人。他最愛打擊的是瓦克爾（Wacker）。這個學生的確是很魯鈍的。但有一天，最大多數人（即使不是所有的人）都覺得布爾蘭祇給瓦克爾「零分」是不公平的。

「給他一個合奏罷，」學生們低聲說着，互相睜睜眼，碰碰手灣。所謂「合奏」就是說：一個教員下了課出講堂時，全班的人同時發出嗡嗡的聲音送他出去。

「法國人」剛剛把點名簿夾在臂下，最遠的一角就「嗡」起來了，這聲音如浪潮一般，直滾到最近門口的課桌上。至於我，我是盡可能「嗡」着的。